

旅泰越南难民：反叛乱中的少数民族管控

撒迪尤斯·弗拉德

概述

本篇述评旨在阐明越南少数民族在泰国近代史上的政治作用。这个主题的重要性源于长期以来根深蒂固、未经审视的主观臆断，关于泰国统治阶级所扮演角色，关于二战以来美国新殖民主义理论家们所持泰国历史上的社会革命具有外来性的观点。如果社会革命真的卷土重来，那么，它一定是跨国革命的结果，而非泰国社会历史的本土因素。按照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越南革命运动成为了反面角色，而且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主要反派。那些抵抗帝国主义的越南人极具战斗精神，首当其冲成了替罪羊。他们为了躲避法国而后美国入侵祖国带来的毁灭性影响，暂时逃到泰国避难。长期以来，他们被视为（如今曼谷当局仍将其视为）虚拟“阴谋破坏者”，革命的前线代理人，亦与“幸福”的泰国格格不入。

希望这篇有关在泰国的越南少数民族的历史述评有助于消除所谓泰国人民自己不能革命的谬论，同时也有助于揭露最近在美国推动的反叛乱政策帮助下，泰国统治阶级一直以来且如今仍然对越南少数民族实施的管控方式。让越南少数民族摆脱泰国政府自身无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困境的替罪羊角色（并将其从美国学术界的反共陈词滥调中删去），将有助于将问题聚焦于本应之处：放在泰国人民自身上，放在他们为尊严和社会公正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上。

本述评以回顾泰国落入帝国主义控制前的越南少数民族开篇（第一部分），探讨法国殖民时期的移民构成及其政治观的演变，特别提到他们在 1930 年组建共产国际暹罗支部（the Comintern's Siam Communist Party）以来发挥的独特作用。对后一问题的分析直接源于泰国共产党（Thai Communist Party）的新近文件（第二部分）。而后，基于压制性泰国政府和泰国人民（群众）的区分，就泰国对越南少数民族所持“态度”这一总体问题展开讨论。在这方面，还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印度支那三国和泰国（1940—1945 年）引起泰国东北部民众和越侨反帝情感共鸣进行研究（第三部分）。难民是外国侵略者大军压境之“先头部队”这一谬论在战后逐渐强化，泰国政府如今事实上已经成为美国反叛乱行动走向纵深的爪牙，对移民实施日益加剧的镇压，在本文中都有述及。这一分析涵盖了法国印度支那侵略战争时期（French Indochina War era，第四部分）和美国印度支那侵略战争时期

* 本文系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 2020 年度规划课题“中国在东盟国家开展境内外办学基础研究”（项目编号：2020-G11）阶段性成果。

(American Indochina War era, 第五部分)。最后, 本文从此视角出发, 试图对 1976 年 10 月 6 日政变后军事独裁政权及其强硬反共政策下, 越侨(不包括西贡政权垮台后的新移民) 愈发岌岌可危的状况进行简要评估(第六部分)。

下文绝非对这一问题的详尽论述。同样, 它既不是民族志研究, 也不是关于泰越外交关系的论述。

一、帝国主义控制前的时期

自 18 世纪末以来, 泰国一直是越南人躲避本国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避难所。与早期的商人不同, 泰国(当时被称为暹罗)最早的越南难民社群, 属于阮氏(Nguyen)皇族。阮氏位于顺化(Hue)的权力中心被西山起义(the Tay-son Rebellion, 1771—1802 年)推翻, 这是 20 世纪前越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当今曼谷却克里王朝(Bangkok dynasty of Chakri)的开国君主对这些躲避越南社会革命的贵族难民持欢迎态度。他本能地认识到, 在某种程度上, 西山农民这样的“咆哮之军”也标志着对周边国家君主制和皇家特权的威胁。因此, 出于巩固社会阶层和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 他派遣泰国军队帮助阮氏家族镇压农民起义军。阮氏家族成功地打败了这次传统起义, 并在越南建立了阮氏王朝(1802—1945 年)。^①留守在泰国首都地区的早期难民定居在邦坡(Bangpho), 位于今天的曼谷市(泰语称为 Krungthep)内。

阮氏统治下的越南王朝统一了国家, 由于两国在老挝和柬埔寨地区均有扩张传统帝国版图的谋划, 最终导致越南皇室与泰国统治精英走向对立。由此引发的系列冲突均属于东南亚大陆君主之间无休止战争的一般范式, 一方面他们意在争夺耕种农民这支劳动力大军, 为其创造财政收入以保王朝永续, 同时农民当然还为君主征战沙场。19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 来自下层阶级的越南难民新群体流亡到泰国, 其主要构成是泰国军队在越南和柬埔寨作战时虏获的战俘。他们当中的佛教徒通常被送往泰国东南部的尖竹汶府(Chantabun), 而皈依法国天主教的越南教徒通常被安置在散森(Samsen)地区(现曼谷市内)并由葡萄牙天主教牧师监管。后来, 尖竹汶周围的一些越南佛教徒被允许迁往曼谷及其周边地区, 他们最终在那里形成了大约五六千人规模的少数族群, 主要在邦坡附近的湄南河(Chao Phraya River, 又名“昭披耶河”)上捕鱼为生。

^① 顺化阮氏家族和泰人最早接触与西山起义有关, 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吞武里王朝郑信王(Somdet Prajao Taksin)统治时期(1777—1782 年)。关于这些和此后的泰国与阮氏接触的重要原始资料包括 the *Phongsawadan yuan* (Vietnamese Chronicles [《越南编年史》]), Bangkok, 2 vols., 1899, esp. vol. II, 370ff, 这部越南语译著由 Nai Yong 翻译, Luang Damrong Thammasan 和 Nai Wan 编辑, 书名可能是 *Vietn am su-ky*; Jaophraya Thiphakorawong, comp., *Pbraratcha phong-sawadan krung rattanakosin: ratchakan thinnung* (Dynastic Chronicles, Bangkok Era, First Reign), Bangkok, 1961 passim。有价值的二手资料包括 Thanom Anamwat, *Khwamsamphan rawan thai, khamen lae yuan nai samai rattanakosin ton ton* (Relations between Thai, Khmer and Vietnamese in the Early Bangkok Era) (《曼谷王朝早期泰国、高棉和越南之间的关系》), Bangkok, 1973, 177 ff; K. Wenk (G. Stahl, trans.), *The Restoration of Thailand Under Rama I, 1782-1809*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8), 110-18; Le Thanh Koi, *Le Vietnam: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chap. Vii。

19 世纪 2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中期，由于明命帝（Minh Mang，1820—1840 年）、绍治帝（Thieu Tri，1841—1847 年）、嗣德帝（Tu Duc，1848—1883 年）实施严禁基督教传播政策，天主教难民大量涌入，东南部地区的越南社群规模随之略有扩大。这些天主教徒从南部经海路北上，在泰国沿海诸地定居，包括偏远的东南部的达叻府（Trat）、尖竹汶府和罗勇府（Rayong），以及泰国湾（Gulf of Thailand）曼谷以西的沙没颂堪府（Samut Songkhram）。其他人沿湄南河上行至曼谷地区，定居在北榄港（Paknam）和帕巴登县（Paklat，即 Phrapradaeng），甚至北上更远至首都以北 250 公里的北榄坡府（Paknampho）和那空沙旺府（Nakhonsawan）。^①所有这些越南难民都是被西方帝国列强之前的力量推向该地区的产物。他们似乎都是平民（即不是官吏或文人），并没有后至者的政治意识或各类“民族主义”思潮。^②

二、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1890—1945 年）

大约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末，一批新类型的越南人流亡至泰国。这批难民来自于被法国残暴占领过的越南南部和中部地区。^③来自南方的难民最初在其先辈居住地附近定居，沿着泰国东南海岸，延伸进曼谷地区的帕巴登县附近。19 世纪 90 年代，“勤王运动”（Can Vuong Movement）的党羽和其领袖潘廷逢（Phan Dinh Phung）来到泰国。^④这些难民达数百人之众。他们都曾在越南中部地区殊死抵抗法国人的侵略，如今在泰国一侧的湄公河（Mekong River）岸边散落成许多小社群聚居，河对岸就是凯山丰威汉市（Suvannakhet）

^① Damrong Ratchanuphap, *Ruam ruang kio kap yuan lae khamen nai samai rattanakosin* (Collected Matters Concerning the Vietnamese and Khmer in the Bangkok Era), Bangkok, 1964, 251 ff; Bui Quang Tung,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colonies vietnamiennes en Thailand," *France-Asie* XV: 148 (Sept. 1958), 440 (这篇论文和下文中引用 Poole 的研究相似，需谨慎使用，因为带有不加批判的反共偏见，典型的是法国远东学院[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裴光东[Bui Quang Tung]是该学院的一员。因为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对保守的、通常信奉天主教的“老越南人”的采访，裴光东在这个基础上对好战的新越侨做出判断。)；G. Boudarel (trans.), "Phan Boi Chau Memoires," 11 *France-Asie* XXII: 194-95 (1968), 117 note 120.

^② 关于“nationalism”一词解释的意义参考来源于 Anouar Abdek-Malek in *La Dialectique sociale*, Paris, 1972, Part II: "Le phénomène nationaliste". 民族主义在理论上被设想为一个通用和辩证的范畴，其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只是一种历史形式，由其时空环境和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所规定。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写作，包括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许多作品，往往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除了 Abdel-Malek 的著作外，Abdallah Laroui 的著述（如“Marx and the Intellectual from the Third World: or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Retardation Once Again,” *Diogenes*, No. 64 [Winter, 1968], 118-40）以及经常发表在《思想报》（*La Pensee*）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et de recherches marxistes*, C.E.R.M.）的作品，这些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理论选择。

^③ Bui Quang Tung, 440-41. 关于法国占领越南中部的残酷局势，参见 Phan Boi Chau, *Yuenan wangguo shi* (History of the Fall of Vietnam), Shanghai, n.d., 其中描述令人感动。关于越南南部的抵抗运动，它也给泰国增加了许多难民，参见“Yuenan renmin chuqi de kang-fa zhengdou” (Early Anti-French Struggles of the Vietnamese People), *Shixue yicong*, No. 3 (1957), 167-70. 同时参见 David Marr, *Vietnamese Anticolon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27 ff.

^④ 潘廷逢传，参见 Phan Boi Chau, *Yuenan wang-guo shi*, 15-18. 关于“勤王运动”，参见 Marr, chap. 3.

①和他曲市（Thakhek）^②，从那过去就是沦为法国保护国的老挝（1893年后）。这些位于泰国东北部的小社群开创先河，泰国从此成为了印度支那地区躲避外国帝国主义暴行的避难所。他们当中有许多来自越南中部的老游击队员。正是在越南中部地区，发生过越南人民对法国的最顽强抵抗和法国对越南的最残酷镇压。^③

正是这些社群最早吸引了著名文人抵抗战士和早期民族主义者潘佩珠（Phan Boi Chau）的注意。^④1908—1912年期间，约有100名潘佩珠创立的越南维新会（Phan's Duy Tan Hoi）游击队员来到泰国。他们计划在泰国和法属老挝的边境上建立自给自足的农业社区，作为反抗殖民统治斗争的海外根据地。在潘佩珠副手邓德华（Dang Thuc Hua/ Dang Ngo Sinh）的领导下，这些激进分子从事小农经济和手工业，向邻近的泰国村民流动兜售火柴、布料、药品等。除了在老挝对面的湄公河畔根据地外，他们还在泰国中北部的披集府（Phichit）、那空沙旺府、南邦府（Lampang）和彭世洛府（Phitsanulok）等地保存很有影响力的社群。^⑤

据他们所言，这些新来的难民很受泰国农民的欢迎，他们在各府勉力维持生计。然而，与早期19世纪的流亡者不同，这批东北地区新难民倾向于将泰国视为长期反法斗争的临时庇护所，尽管事实上法国殖民警察有效地大大延长了他们在泰国的停留时间。他们怀揣着早期反法斗争的记忆与传奇，继续为祖国的最终解放制定计划。然而，后者是零星“投弹”类型，缺乏政治智慧。正如一位受过政治训练的25岁左右的越南人所注意到的，泰国中部和东北部的侨民社区对其所面临的帝国主义历史问题缺乏全面认知。^⑥然而，这些年来，他们仍然是忠诚的爱国者。20世纪初，在俄罗斯社会主义新政权的协助下，中国南方掀起了一场强有力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这似乎为印度支那摆脱法国控制点亮了光明前景。

正是这一崭新前景激励了东北地区老移民领袖邓德华，他在20年代初派遣一批激进的移民青年到广州学习。1923年底或1924年初，他们与来自越南的激进分子一起组建了“心心社”（Tam Tam Xa）。该团体联系在广州的苏联人，寻求对反法计划的支持。^⑦后来

① 凯山丰威汉市（Suvannakhet）是老挝第二大城市。——译者注

② 他曲市（Thakhek）是老挝中部城市。——译者注

③ Boudarel, 117, note 120; Marr, loc. cit.

④ 关于潘佩珠，参见 Boudarel, *passim*; Marr, esp. chap. 4 ff; Kawamoto to Kunie, “Han hai shu shoshi” (Brief History of Phan Boi Chau) in Nagaoka S., Kawamoto K. (eds.), *Betonamu Bokokushi* (History of the Fall of Vietnam), Tokyo, 1966, 223-55. 参照前文的注释，潘佩珠的职业生涯跨越了民族主义的两种类型：

（1）传统的文人风格，符合 Joseph Levenson 所说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m]”（*Liang Chi '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109 ff）和（2）1924年至1925年对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初步认识。例如，与孙中山不同，潘佩珠从未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说话。

⑤ Nagaoka and Kawamoto, 143-46. 这是日译本，原著是 Phan's *Nguc Trung Thu* (Prison Notes): Tran Dan Tien, *Hu zhi ming chuan* (Ho Chi Minh Biography), Shanghai, 1948, 85-86; *Nhung Man Chuyen ve Doi Hoat Dong cua Ho Chi Tich* (Anecdotes from Chairman Ho's Life)的中译本。这是最早的、在某些方面最清晰的胡志明传记。西文版本有很多删节。

⑥ Le Manh Trinh 的回忆录出自 *Hu bo bo*, Hanoi, 1962, 94: 完整的中译本 *Bac Ho, Hoi Ky* (Reminiscences on Uncle Ho), Hanoi, 1960 (西文版本存在关键内容遗漏); Tran Dan Tien, 85-86.

⑦ Boudarel, 129, 132, 181 note 178, 193 note 190. 关于苏联和“心心社”之间的合作，以及苏联和潘佩珠之间的合作，参见 M. A. Cheshkov, “On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Soviet-Vietnamese Revolutionary Ties,” *Narod y Azii i Afriki*, No. 6 (1967), 84-88 (由 Ramsdale Gurney 博士为笔者翻译)。

在 1924 年 12 月胡志明 (Ho Chi Minh, 即阮爱国 [Nguyen Ai Quoc]) 从法国经俄罗斯抵达广州时,“心心社”的一批年轻成员成为了其首批干部的最初核心力量,包括来自泰国的成员。他们是越南第一个国际主义反帝国主义斗争团体的最早成员,该团体由胡志明于 1925 年 6 月在广州成立,即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Hoi Vietnam Thanh Nien Cach Mang Dong Chi)。这个团体是印度支那共产党(Indochinese Communist Party)和如今已经解放的越南劳动党(Lao Dong Party)的前身。^①

胡志明青年团体(Thanh Nien group)的年轻干部在广州参加了“特别政治培训班”,这是他们首次接触到认识帝国主义的全面框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然后他们被派回去组织工人和农民协会,大部分被派回越南,另一些被派回泰国东北部的侨民社区。^②

胡志明对越南(以及中国)农民革命能力的关注至少可以追溯到 1923 年底,他当时是法国共产党的代表,与莫斯科的农民国际(Krestintern)保持着联系。^③往往被忽略的一点是,他的兴趣和理论关注早于大多数后来的亚洲共产党农民运动领袖,但与他相识的早期中国农民运动领袖彭湃是个例外。^④因此,早在 1925 年,胡志明带领的“特别政治培训班”首届毕业生回到泰国,就着手组建革命农民协会。当时东北地区移民人数约为 2 万人,但是最初的结果却相当令人失望,因为尽管他们满怀思乡情爱国心,但缺乏政治意识、组织性和长期规划。为此,青年团体建立分支组织,在移民中开展教育工作。他们并未关注自 19 世纪以来定居于此的“老越南”,大多信奉天主教。

青年团体干部们在乌隆府(Udon Thani)、那空拍依府(Nakhon Phanom)、沙功那空府(Sakon Nakhon)、穆达汉府(Mukdahan)和东北部其他地方建立农民协会,即 Ho: Than Ai(兄弟会)。农民协会旨在把移民集中起来,开展社区团结和民族主义情感教育。

1925 年后,另外一些激进青年跨过湄公河逃离法属老挝,在泰国一侧岸边的侨民社

^① Truong Chinh, President Ho Chi Minh, Hanoi, 1966, 14-15;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Direction des Affaires politiques et à la Sûreté générale,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s Mouvements politiques de l'Indochine française*, Hanoi, 4 vols., 1933, IV, 14 ff; Chiang Yung-ching, *Hu zhi ming zai zhongguo* (Ho Chi Minh in China) Taipei, 1972, 41 ff. 尽管它有很古怪的反共偏见,但这仍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作品,因为它使用了原本无法获得的国共两党在台湾关于胡志明和华南地区越南解放运动的档案材料,作者的研究给 K.C. Chen 启示,参见 *Vietnam and China, 1938-5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西方最好的一部胡志明传记是 C. P. Ragueau 著写的 *Ho Chi Minh* (Paris, 1970)。劳动党于 1976 年 12 月成为越南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② Le Manh Trinh in *Hu bo bo*, 94; Tran Hoai Nam, *Yuenan renmin de jiefang douzheng* (Liberation Struggles of the Vietnamese People), Peking, 1954, 61. 出生于泰国的年轻人 Le Van Trong 也成为送去广东的一员,他 15 岁时加入了青年团体(Thanh Nien group)。他于 1931 年在法国殖民安全局逮捕,遭受酷刑并被送上断头台。Brief biography in *Vietnam*, No. 92 (1965), unpag.

^③ Gouvernement général, IV, 14. 有关法国共产党对亚洲反殖民主义运动的狭隘性参见 Gérard Walter, *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Paris, 1948 (379), 其中胡志明短篇传记完全来自这份法国殖民安全局报告。

^④ Conseil Paysan International. *Ire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e Paysanne: Thèses, Messages, et Adresses*, Paris, n. d. (1923 年末)包括法国代表团(即胡志明)对世界农民和妇女的宣言,写于 1923 年 10 月中旬。Nguyen Ai Quae (sic = Ho Chi Minh), “La Situation du Paysan Annamite,” *Le Paria*, December 1923, 1, 转载于 *La Vie Ouvrière* January 1, 1924, 3, as “En Asia: La Situation des Paysans”, 并附有一篇关于中国农民的长文,署名阮爱国(Ng. Ai Quac)。这些由俄罗斯寄到巴黎,胡志明 1923 年底到 1924 年底到苏联旅行、学习和观察苏维埃生活。

区建立劳动合作社（Hoi Hop Tac）。劳动合作社的成员一起开垦用于耕种的土地（此时东北地区没有人口压力），共享劳动工具，除了保留最低水平生活收入外，他们将其余收入投入到劳动合作社共同基金中。这极大地支持了印度支那革命工作。劳动合作社很快成为印度支那外围革命的骨干基地，成为国内革命斗争的重要资金来源。

大约 1928 年 8 月，胡志明抵达泰国，兄弟会和劳动合作社已经在泰国开展活动。^①这些泰国东北部移民基地是继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和蒋介石开始实行“白色恐怖”后，仅有的反法斗争基地，这足以说明胡志明亲临当地的原因所在。然而由于法国殖民安全局（French Surete Coloniale）的紧盯，他不得不用许多化名，如“Thao Chin”就是其中之一，意思是“老金先生”。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胡志明徒步于社区之间，与移民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倾听他们每天勉力维生的分享，这使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农民的状况。在这一点上，胡志明与他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潘佩珠非常相似。

有趣的是，胡志明在泰国似乎第一次摸索出农民运动的经典组织策略，后来成功助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浪潮，并成为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学习的榜样。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他对最下层农民或流动小贩的平等和尊重。同时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尊重也惠及到了东道国及其人民。他坚持要求同胞尊重泰国佛教，遵守泰国法律和习俗，这为东北地区的侨民社区开创长期先例（当时泰国还没有颁布反共法案）。他批评老移民对学习东道国的语言和习俗兴趣不大。他坚定认为，这样做可以得到泰国人的同情理解，以及他们对反殖民事业的支持。为了给移民树立榜样，他带头学习泰语，并提出移民可以向政府申请开办学校，同时招收越南和泰国学生。他每到一个社区，都会强调识字和教育。此外，他还推动了医疗设施向移民开放。

就越南人而言（正如最大的少数民族华人群体一样），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泰国人对越南人有自发的、本土的、普遍的仇恨。就泰越两个族群的关系而言，事实上有很多证据表明，在 20 世纪，当地的泰国村民经常保护越南人免受法国和泰国警察的迫害。此外，为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泰国政府经常在泰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族群差异性上大做文章。

与这些做法同步的还有对赌博、酗酒和沉迷古老迷信等行为的不易察觉的巧妙打击。特别是，他试图取而代之，反复灌输以政治与社会意识以及民族自豪感。对于其中识字的人，胡志明敦促他们阅读《青年报》（*Thanh Nien*）和其他杂志；对于不识字的人，他和干部们会在晚上参加村里的集会，站在中间竭尽全力为大家朗读和解释革命报刊。这样，他们向移民注入了更明确的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情绪和意识。胡志明亲自结合相关的当代政治主题创作通俗易懂的诗歌和歌曲，将民族主义和政治主张移植到悠久的乡村传统之中。他为古老的乡村小调新谱歌词，为田间地头或乡村小道上广为传唱的农夫之歌添加上

^① 关于胡志明在泰国短暂停留的具体日期参见 *Hu bo bo*, 106;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orkers Party, ed., *Our President Ho Chi Minh* (Hanoi: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0), 91, 94; *Gouvernement général*, IV, 24-25.

民族主义的音符。他投身于社区戏剧，用模仿的手法将新的政治社会情感引入旧式对话中。

①

为进一步阐明这批越南革命中心在泰国发挥的作用，有必要更密切地沿着这段时期胡志明在该地区的活动。1929年6月中旬左右，他离开泰国东北部，前往曼谷，可能是为了将散落于此的老一批越南革命者组织起来。^②他着手将青年团体与其他越南革命团体集中发展优势，形成单一革命政党，以回应越南国内的客观条件，以及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或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7—9月）关于用各国政党或“支部”来取代区域革命中心的呼吁。^③自然，无论哪个党派成功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都会立即获得国际威望、提高组织能力并获取共产国际的资金支持。

基于此，胡志明于1929年秋离开泰国，前往英属香港九龙半岛。1930年2月3日，他主持召开联合代表大会，成立越南共产党（不久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④但是，据泰国老战友 Le Manh Trinh 说，胡志明于1930年3月返回泰国东北部“停留几天”，给越南革命者带来新政党及其纲领的最新信息。^⑤然而，根据泰国共产党就自身历史所发表的声明，我们发现当中有这样一段话：“1930年，第三国际代表胡志明同志来到[泰国]，成立了暹罗共产党（Phak Khommunit Sayam），作为第三国际的分支机构……。”^⑥事实上，这与胡志明长期保持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响应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设立各国支部的呼吁是非常一致的。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就越南在泰国的作用发挥而言，成立这样一个政党并不符合泰国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说，与中国和越南不同，泰国人的客观条件（不同于政治上成熟的华侨和移民到泰国的越南人），他们既不需要，也不支持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正如泰共发言人指出，泰国特有的历史条件导致泰国人政治意识淡薄。^⑦转化为政治现实，这就意味着暹罗共产党在1939—1940年解体之前一直由非泰成员组成（导致其在1942年12月重组为泰国共产党）。^⑧中国人和越南人占了政党成员的绝大多数，然而他们

① 上述内容基于关于 Le Manh Trinh 和 Tran Lam 的内容，参见 *Hu bo bo*, 93-107, 108-114，这两个人都是胡志明在泰国的青年干部；Gouvernement general, IV, 24-25; Tran Dan Tien, 85-90。同时参见 Tran Van Dinh, “The Rhetoric of Revolt: Ho Chi Minh as Communicato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Autumn, 1976, 142-47。

② Le Manh Trinh in *Hu bo bo*, 106.

③ Tru’o’ng-Chinh, *President Ho Chi Minh*, 16-17; Vietnamese Workers Party, ed., *Thirty Years of Struggle of the Party* (Hanoi: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0), I, 21-22; Tanigawa Yoshihiko, *Tōnan ajiya minzoku kaihō undōshi*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Tokyo, 1969), 83-86 (based on Tran Huy Lieu’s researches); Jane Degra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Documents* (London, 1960), II, 526-48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

④ Tru’o’ng-Chinh, 17; *Our President Ho Chi Minh* 94.

⑤ *Hu bo bo*, 106.

⑥ 泰国共产党1974年8月机密资料。英国和法国警方的消息来源认为胡志明于1930年4月在新加坡对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起了同样的作用。参见 Charles McLane, *Soviet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132ff.

⑦ TCP, 1974, 6-8 解释说，泰国革命运动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其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动力直接来自亚洲（中国和越南），而不是像亚洲几乎所有其他革命运动那样来自欧洲。

⑧ TCP, 1974, 9.

只热衷于自己祖国的解放和革命事业。^①

暹罗共产党的历史以及越南人（和中国人）的党内角色说明了 20 世纪亚洲历史中共产国际的形式主义作用。它作为共产国际的“暹罗支部”正式存在了 10 年，从共产国际的文件上来看，它应该对泰国革命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正如泰国共产党（其前身为暹罗共产党）所承认的那样，早期党内几乎没有泰国人，主要由中国和越南两国的革命者组成，他们同时也是本国革命团体的成员（中国共产党和印度支那共产党暹罗支部）。整个 10 年间，暹罗共产党在泰国的活动仅限于在曼谷偶尔发传单和扛红旗，在泰国东北部农民（很可能是越南人）和曼谷青年学生和劳工（很可能是华侨）群体中做一些微乎其微的工作。具体来说，它并没有为泰国做什么，因为就泰国的客观条件而言，它的存在显得为时过早。^②

该党成员对其他地区（中国和越南）解放斗争的矢志不渝，正是其存在备受质疑的原因所在，质疑来自泰国和西方警察以及共产国际亚洲历史阴谋论的学术拥趸。尽管如此，其存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共产国际“国家政党”的形式需求，然而很明显的是，它满足的是泰国境内的越南（和中国）革命者的真实需求。正是后者最终成为泰国激进知识阶层、泰国共产党和城市左翼运动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除此之外，越南人（和中国人）在暹罗共产党的存在并未支持、反倒是消解了美泰反革命势力想要培育的这样一个观念：即他们是越南人（或中国人）入侵泰国的颠覆性、阴谋性非泰分子“先锋队”。实际上，泰国东北部越侨中心不是先锋队，是越南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的大后方。

1927 年，中国的国民大革命失败。1929 年，青年团体在第一次代表大会（香港）上指定泰国东北部侨民社区为政治难民的“休养中心”。^③1930—1931 年，随着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成立和义安—河静苏维埃运动（Nghe-Tinh Soviets）的失败，更多的革命者来到泰国东北部侨民社区避难，因为这里已经成为抗法斗争的革命基地。^④根据泰国共产党的说法，截至 1935—1936 年，越南革命团体遭受泰国政府镇压和警察渗透，导致暹罗共产党的大多数越南成员或被监禁或被驱逐出境。^⑤1935 年后的人民阵线时代（the Popular Front era），东北部侨民社区的革命重要性有所减弱。随着中国的第二次联合阵线的建立，东北部侨民社区再次成为越南解放斗争的主要门户。泰国东北部直到四十年代初才再次成为重地。

^① 例如，法国殖民安全局在 1933 年特别指出，青年团体在旅泰越南人中进行煽动，其目的是争取在印度支那而不是在国外建立政党。Gouvernement général, IV, 18.

^② TCP, 1974, 9.

^③ Gouvernement général, IV, 61.

^④ 同上，43-44, 61，指定 Ngo Chinh Quoc 和 Ngo Chinh Hoc 为泰国东北部“越侨共产党人”领导人，并指出 1933 年 4 月在那空拍依府班迈举行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大会号召从越南招募干部，在班迈接受革命教育，印度支那共产党在那里成立了一个临时执行委员会；TCP, 1974, 9。同时参见 Tranh Van Dinh, “The Birth of the Pathet Laos Army,” in Nina Adams and Alfred McCoy, *Laos, War and Revolution* 428, note 8。关于义安—河静苏维埃政权，参见 Rageau, *Ho Chi Minh*, ch. 8.

^⑤ TCP, 1974, 9。这份资料还表明，1937 年日本入侵华北后，暹罗共产党内的华裔干部发起的反日鼓动遭到了政府的镇压，因此暹罗共产党内的华裔干部也经历了类似命运。笔者认为泰国政府对华裔和越裔干部的这种严厉镇压是 1942 年组建真正意义上的泰国共产党的关键因素。

三、泰国的态度（1900—1945年）

为了了解泰国人对越侨的接纳态度，有必要对泰国人民和泰国政府做一区分——由于资产阶级哲学上的偏见，这种区分几乎从未得到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越侨对此做了区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也对此做了区分。^①美国人类学家和反叛乱官僚倾向于将泰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和政治等同于“泰国人民”，从而在泰国人和越南人（以及华人和泰国的其他非泰族群）之间造成了一种无法证明的“天然的反感”或族群仇恨印象。^②了解泰人及其语言的人都可以证实，泰人确实有其地域偏见、种族诙谐和地域笑话。然而就越南人而言（正如最大的少数民族华人群体一样），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泰国人有自发的、本土的、普遍的敌意。就泰越两个族群的关系而言，事实上有很多证据表明，在20世纪，当地的泰国村民经常保护越南人免受法国和泰国警察的迫害。^③

另一方面，为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泰国政府经常在泰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族群差异性上大做文章。特别是（但不仅仅是）在20世纪，泰国政府在泰人和少数民族之间人为地制造对抗，华人就是典例。^④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对具有政治意识和反帝国主义情结的东北部越侨（不是前帝国主义时期政治冷漠的“老越南人”）进行镇压，看似符合泰国这个官僚国家的需要。从历史视角来看，泰国统治阶级对移民的天然反感，最终归结于前者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与资本帝国主义保持着有机联系，无论是英国、日本，还是目前的美国。自1855年官僚君主制国家签订了《鲍林条约》（Bowring Treaty）以来，泰国政府一直保持着其“独立性”（指面对国内大众的政治优势），实际上它的存在只是受制于西方帝国主义（以及短暂的日本帝国主义）。它只是作为帝国主义剥削泰国人民的从属代理人而存在，它接受这一角色以换取持续的国内政治霸权。尽管自1855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文明对泰国的渗透，泰国统治阶级发生了演变，但这种历史联系依然存在。1932年后，随着绝对君主制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华人）资产阶级支持的军人官僚阶层掌控下的傀儡君主，这意味着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只会更加增强。因此反抗帝国主义在过去不可能，现在也不可能成为泰国统治精英阶层喜闻乐见的事业。

^① Dr. Boonsanong Punyodyana, “Khrai thamhai jin ben 'banha' nai sangkhom thai?” (Who made the Chinese a ‘problem’ in Thai society?), *Sun*, 1: 5 (16 March 1974), 8-11, 强调了这种区分。

^② 参见下面的文本和注释，了解这种腔调的例子。

^③ Vietnamese testimony in Le Manh Trinh and Tran Lam memoirs in *Hu bo bo*, 93-107, 108-14; Tran Dan Tien, 85-90, esp. 88; Liem Tran interview in *Sun*, 1:5 (16 March 1974), 29-30（李安是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初泰国东北地区越侨社区的首席发言人）。泰国对这一信息的确认来自于许多非政府渠道，例如，Suwansit Naphakom, “Rao ma japkum khon yuan to bai thoed!” (Let’s Continue to Seize the Vietnamese!), *Sun*, 12-15, 这是泰国国家学生中心关于泰国少数民族的专刊，刚被引用过。另参见 Kua Muonchon (pseud.), “Yuan ophayop...phonlamuang praphet song” (Vietnamese Emigres: Second-class Residents), *Maharat*, March 23, 1974, 16ff.

^④ 关于泰国政府对待少数民族的有价值著述包括 Boonsanong Punyodyana, “Minority Groups and Minority Class,” unpubl. ms.; idem, “Khrai thamhai jin ben ‘banha’...” 8-11; Andrew Turton, “National Minority Peoples in Indo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 3 (1974), 336-42; Bo Gua, “Opium, Bombs and Trees: The Future of the H’Mong Tribesmen in Northern Thailand,” *JCA*, 5: 1 (1975), 70-81。这些著述对该问题持批判性态度；笔者省略了许多典型的自由主义学者纯“描述性”或实证性研究。

鉴于泰国政府及其统治阶级自 19 世纪中后期以来与全球帝国主义的关系，不足为奇的是，越南反抗法国殖民主义斗争的最初煽动者在印度支那当局的授意下经常遭到骚扰和驱逐，尤其是在 1908 年后（尽管泰国皇室中少数人对其持同情态度，如同他们对同时代身在泰国并志同道合的日本泛亚主义者持同情态度一样）。^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成立了殖民地警察部队——法国殖民安全局。为了追踪反殖民主义斗争煽动者，泰国王室的秘密警察继续通报越侨情况，并根据殖民安全局的要求追捕和驱逐他们。^②1933 年，新组建的军政府（在保皇派的压力下）正式通过反共法案，数十名越南反殖民侵略革命者遭到逮捕，并被赶到曼谷北部暖武里府（Nonthaburi）臭名昭著的曼谷监狱（Bangkhwant Prison）。^③

1933 年后执政的军政府统治精英们一味地效仿 19 世纪和 20 世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固有的强制手段，特别是（但绝非唯一）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资产阶级公开的军国主义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从民族主义视角反抗法国，对法国夺取老挝和柬埔寨领土深感不满，而这些领土曾是泰国政府先前通过武力占领过的。虽然他们在这方面对法属印度支那政权怀有深深的怨恨，但如上所述，他们不可能反抗全球帝国主义体系，因为他们也与该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他们并不比 1932 年之前的保皇派前辈们更愿意支持反抗帝国主义的社会革命。正如君主制将“民族”等同于自己一样，1933 年后军政府统治的国家将“民族”与军政府统治精英相等同。他们在具有明显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精神的东北部侨民社区（1925 年青年团体来到这里后），真切地感受到另一种“民族”，这里的“民族主义”和群众（农民）是同义词，这是一种无军队精英一席之地的民族主义。为了对抗这种危险的民族主义，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越侨赶进监狱（他们对华裔少数民族中的中国民族主义革命者如法炮制）。同时，他们以“传统社区”和从未存在的所谓“民族团结”为基础，培育了一种人为的“民族主义”情绪。1933 年后泰国政府将其民族主义建立在人为推动的种族主义之上，这不可避免地给少数民族带来恶果，当然也使精英主义结构在理论上保持了完整。^④

30 年代末，在军事独裁者披汶·颂堪（Phibun Songkhram）的领导下，泰国政府摆脱

^① Boudarel, 119 note 123. 关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日本在泰国的反西方的泛亚洲主义运动和泰国的同情者，参见 E. Thadeus Flood, “The *Shishi* Interlude in Old Siam: An Aspect of the Meiji Impact in Southeast Asia,” in David Wurfel, ed., *Meiji Japan's Centennial: Aspects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Action*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71), 78-105.

^② 参见 Le Manh Trinh, in *Hu bo bo*, 106, 描述了他被泰国政府逮捕，随后与其他 10 名移民一起被驱逐到汕头。

^③ 参见 Thadeus Flood, “The Thai Leftw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7, No. 2 (April-June 1975, 57-58 and notes 34 and 35)。这篇文章于两年前发表，对那些不熟悉文中提及的泰国某些方面历史的读者来说或许有用。

^④ Yano Toru, *Tai-biruma gendai seiji-shi kenkyu* (Studies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Thailand-Burma) (Kyoto, 1968), 168-69, 228 ff. 这是据笔者所知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已经洞察这个无定形概念群的历史虚假性的研究者，例如包括 *chat*, *sasana*, *phramahakasat* 或民族、佛教和国王，这些概念是在拉玛六世和七世统治时期形成的。从那时起，泰国统治阶级就把它作为一种胁迫和控制的意识形态工具。这种护身符思想的经典表述首先出现在 Wijit Matra (Sanga Kanjanakphan), *Lak thai* (the Thai Polity), Bangkok, 3rd ed., 1935, 于 1928 年甫一问世，即被授予皇家嘉奖。“*lak thai*”的概念在纳粹雅利安人的“*gemeine*”或日本法西斯主义的“*kokutai*”和其他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不那么显眼的象征中也有其对应词，被用来培养正统观念和非批判性忠诚。

了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体系，并逐渐与日益崛起的日本帝国主义结盟。这种新的泰日结盟最终为泰国人民（最初是东北部的移民）和印度支那人民之间的反帝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这是因为日本帝国在维希法国政权的默许下将其军事控制首先扩展到印度支那，然后于 40 年代初扩展到泰国。^①西方国家卷入随后的太平洋战争（1941—1945 年）并助推了这种一致反帝的浪潮。披汶执政的泰国政府同日本一起向同盟国宣战。因此，英国、美国和中国的秘密组织与各种各样泰国和非泰少数民族团体合作，共同反对披汶·颂堪独裁政权及其泰日同盟。这促成了泰国东北部的抗日游击队和反披汶游击队的武装化（主要是因为美国 OSS）。^②同时，同盟军（尤其是 OSS）对胡志明的越南独立同盟会（Vietminh，简称“越盟”，成立于 1941 年 5 月）提供援助，帮助他们在印度支那抵抗日本人和与日本人合作的海军上将让·德古（Admiral Jean Decoux）负责的维希殖民政权。^③

与越盟成立同年，在泰国东北小城乌隆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组织，即泰国—老挝越侨救国协会（Viet Kieu Cuu Quoc Hoi Thai Lao），简称为救国会（Cuu Quoc）。它由许多老革命家组成，其最重要的领导人都是 1930 年起义失败后逃往泰国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党员。它是隶属于胡志明越盟的众多群众组织之一。救国会 1936 年后的策略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组织有相似之处，也与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初在中国和曼谷由其赞助成立的众多救国团体有相似之处。^④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救国会总部设在泰国东北小城沙功那空。面对共同的日本敌人，泰国东北部的游击队运动（最初被称为 klum ku cbat 或民族救国团，后来被称为 seri thai 或自由泰国）和东北部的越南救国协会团体之间形成反帝国主义情绪的天然统一。因此，在战争期间，救国协会移民能够在泰国东北部公开活动，并在老挝秘密活动，反抗法日帝国主义政权。^⑤

太平洋战争后期，泰国东北部的越侨社区发现自己处境奇特。他们把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与印度支那共产党（1941 年后越盟）领导的运动联系在一起。他们同情发展中的老挝反殖民运动（本身受到越盟模式的影响）。他们与同盟军武装的泰国东北部地下游击队有着类

^① 日本向印度支那半岛和泰国侵略扩张的纯粹经验研究，参见 E. T. Flood, “Japan’s Relations with Thailand 1928-41,” unpubl.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8 中的日本和泰国档案材料。不幸的是，在这项研究中没有提出任何重要的理论表述。

^② Harris Smith, *OSS: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First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311. 该书声称，到战争结束时，已有 175 吨装备被运达泰国领土。关于战时对日抵抗运动对泰国社会政治史的意义之简要论述，参见 Flood, “Thai Leftwing...,” 58 and notes 39, 40, 41。

^③ Smith, *OSS*, chapters 9, 10. 关于越盟的组建，见越南北部高平省 Pac Bo Cave 举行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两位与会者回忆录：Vu Anh and Vo Nguyen Giap in *Hu bo bo*, 147-50, 166-67; Huynh Kim Khanh, “The Vietnamese August Revolution Reinterprete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X: 4 (August 1971), 772 and notes; Tanigawa Yoshihiko, *Tonan ajia minzoku kaibo undoshi* (Tokyo, 1969), 121-28 and notes.

^④ Tran Van Dinh, “The Birth of the Pathet Lao Army,” 428 and note 8（Tran 是 1945 年底至 1946 年，在泰老边境与越侨接触的越共干部）；Huynh Kim Khanh, 772-73; Chiang Yung-ching, 94 ff（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救国团体）；Flood, “The Thai Leftwing...,” 58 and notes 39-42（关于曼谷的中国救国团体和泰国 *Ku chat* 团体）。

^⑤ Tran Van Dinh, 428 and note 8. 关于泰国抵抗运动与老挝反殖民运动的联系，参见 Michel Caply, *Guerilla au Laos*, Paris, 1966, 222-27; Nina Adams, “Patrons, Client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Adams and McCoy, *Laos: War and Revolution*, 109。

似的意识形态联系。这些联系在战后仍然得到维持，并最终形成抵制美国 1945 年后在该地区新霸权扩张的共同事业。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侨民社区从未参与过反对泰国政府的革命行动，这一点可以从负责任的泰国警官口中得到证实，尽管这种坦率而言的机会极其少见（见以下文献资料）。越侨仍然忠实于胡志明在 20 年代发表的宣言。

战争结束后，泰国军方从权力顶峰黯然退下，短命的左翼文官政府开始崭露头角。然而文官政府不够团结。战争期间，文官政府受比里·帕依荣（Pridi Phanomyong）博士的领导，他是泰国境内地下抗日的重要象征。战争期间，比里最亲密的支持来自于泰国东北部地下革命的领导团队。^①比里本人支持越南反抗法国重建殖民政权。战争结束后，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找到他及其战时东北部的支持者，要求他们提供武器，用于抵抗法国殖民统治卷土重来。比里下令将东北地下组织的部分武器装上火车，运到柬埔寨边境的马德望（Battembang），交给越盟军队。这些武器后来在反法斗争中被用作两个越盟营队的装备。^②比里允许越盟在曼谷设立联络处，负责人是陈文教（Tran Van Giau），他是越南南部反法斗争的关键人物。^③与此同时，持同情态度的泰国东北部游击战士跨过湄公河，试图帮助老挝人民就地反抗法国人。^④最后，比里在下台前成立了东南亚联合会（Southeast Asia League），支持该地区的反殖民运动。

四、法国印度支那战争时期（1946—1954 年）

到 1946 年，局势已经转向有利于反动派一方。在美国的支持下，法国军队大举重返老挝。在这一年里，他们经过几次军事行动，将大约 4 至 5 万名越南人赶过湄公河，进入泰国东北部的边境省份。然而在越南人经过湄公河时，遭到法国飞机的扫射。^⑤当时的曼

^① 比里与泰国东北部和越南的思想共鸣，对于战时的亲日本派披汶·颂堪政府来说是心知肚明的。关于披汶政府战前和战时亲日集团的关键人物 Prayun Phamonmontr，参见其自传 *Chiwit ha phaendin khong khaphajao*（我横贯五朝代的一生）（Bangkok, 1975），541-42。1946 年至 1947 年，比里的政治支持力量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这是因为他领导的战时游击队运动很具有农村特色。Khajatphai Burutphat, *Kanmuang lae pbak kanmuang khong thai*（泰国政治与泰国政党）（Bangkok, 1968），178。

^② Pridi Phanomyong, “Raluk thung khun luang sangguan yutthakit”（回忆 Luang Sangguan Yutthakit）in *Anuson nai ngan phrarachathan phloengsop phon rua tri luang sangguan yutthakit*（皇家海军少将 Luang Sangguan Yuttakhit 火化纪念仪式）（Bangkok, 1973），14-15。比里引用了胡志明的一封信，根据这封信，这两个营后来被称为“暹罗营”。关于泰国向老挝境内的越南救国会（Hoi Cuu Quoc）团体转让武器的情况，同时参见 Tran Van Dinh, 428 note 8。

^③ *Vietnam Information Service*（Paris, 1947），7-8；personal communication from Tran Van Dinh。

^④ Loet Nikon, “S.s.sawang trachu: phu mai yom kom hua hai kap thorarat fasit”（Assemblyman Sawang Trachu: One Who Refused to Bow to the Fascist Dictators）*Maharat* No. 218（9 August 1975），12。这是对泰国东北部战时游击队领导人（后来的议会代表）的重要连载采访，该领导人后来又成为（逃避泰国政府政治压迫的）老挝、河内和北京的政治难民，他于 1945 年至 1946 年参与泰国东北部援助老挝反殖民主义斗争。

^⑤ 有关法国残酷行动的两个亲历目击者的描述，参见 Tran Van Dinh, 436, and Sawang Trachu in Loet Nikon, “S.s.sawang trachu...,” *Maharat*, No. 218（9-16 August 1975），12。同时参见 Prince Souphanouvong’s account of the French massacre at Thakhek on March 21, 1946, in Anna Louise Strong, *Cash and Violence in Laos and Vietnam*（New York, 1962），34。

谷政府还是比里支持的，这些逃离法帝国主义的新难民继续得到泰国官方和民众的支持。他们被允许自由行走并选择居住地，政府甚至向他们提供生活费贷款。^①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他们是深受法国极其残酷的军事行动之苦的难民，他们不是侵略者。因此，他们如同其前辈一样，尊重泰国的风俗习惯，与当地居民相处融洽。但是，也许与其前辈不同的是，他们更希望在泰国的居留完全是暂时性的，所有人都希望尽快重返家园。^②事实上，若非美国全力支持法国再度征服印度支那以及泰国境内反动势力，他们原本很可能实现这个愿望。如今东北地区的难民人口日益增长，在东南亚大陆的历史上，他们前所未有地成为了大国干预的受害者。

1947年，心怀不满的泰国军方和警察通过政变推翻了比里支持的政府。当然，军方的愤怒来自于自身曾经的蒙羞，他们将此归咎于比里以及他曾参加的战时抗日运动。战争结束后，处于泰国最北端的军队发现驻地正对着中国军队，于是被迫解散队伍并竭尽所能返回泰国中部地区，通常靠变卖武器、衣物等等。^③除了这一屈辱外，1947年政变领导人还因比里支持该地区革命运动的进步政策而深感不安。他们还对比里公平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感到愤怒，也愤怒于比里取消了之前军政权对华人、泰国穆斯林、越南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主义限制政策。1947年政变使亲日的老独裁者披汶卷土重来，政变的核心领导层明确表示反华反越。同时，对精英政府而言，泰国和邻国的左翼运动带来的后果令其深感恐惧。^④

与泰国统治阶级早先为维持其政权和特权的做法同出一辙，新政权于1950年不失时机地与另一大帝国结盟，而这次是美国。美元和美式军事装备轻而易举地说服了泰国军国主义者，让他们相信严厉的反共政策会带来物质上的好处，特别是考虑到该国本身日益加剧的社会动荡。那时的印度支那所有革命人民正致力于推动建立更为“人道”的社会和政

^① Liem Tran interview in *Sun*, cited, 29; “Wietnam nai thai” (在泰国的越南人), *Prachachat*, No. 148 (September 1976), 8-9; Letter to the Editor signed by 80 Vietnamese from Mukdahan in *Sangkomsat Parithat* 12:5 (May 1974), 7-10; Rit Itthipracha, *Yuan ya le* (title untranslatable: *Yuan*=Vietnamese; *ya le*=metonymics used in colloquial Thai song) (Bangkok, 1975), 62. 关于这本书，参见27页注释^③。

^② 这是笔者看到的从侨民社区到泰国报纸的所有书面通信的一致意见。本研究报告中引用了其中一些内容。

^③ 在提到文官主导的比里运动时，战时泰国政府军队中的两位高级军事领导人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参见 Prayun Phamonmontri, 540, and Net Khemayothin, *Ngan taidin khong phan ek yothei* (Yothi 上校的地下工作), 3 vols. (Bangkok, 1967), III, 751。两者都叙述了战后政府军队在比里的命令下立即复员的情况，这是1947年政变的主要因素。然而，更具体的因素是，比里在遣散“自由泰”(Free Thai)部队及其武器时犯了一个很大的战术错误，从而将战场留给了旧时警察军事机构。正是这个错误使比里永远处于泰国历史的边缘。

^④ 关于1947年的政变，参见 Khajaphai Burutphat, 186 ff; Suchin Tantikun, *Ratthaprahan P.S.* 2490 (1947年政变) (Bangkok, 1972), passim, 但尤其是143-49页 Kat Katsongkhram 将军于1950年的往来书信。Kat 将军是政变的主要推动者。这封信件列举了他发动政变的25条理由，其中7条是公开反华的，另外3条是公开反越和反共的。Kat 将军最初打算清算比里·帕依荣和其他大约200名政敌，其中大部分可能是比里的东北部支持者。参见 Prayun Phamonmontri, 543-44。1950年，吉将军在与披汶发生争执后流亡。

治制度，而泰美同盟使得泰国很快正式成为了他们的敌人。^①随着旧军国主义和公认的种族主义政权在曼谷重新掌权，华侨和越侨均成为了该国不公和压制的社会弊病的替罪羊。1950年后，因披汶政府（美国美其名曰东南亚民主的新领袖）与美国和印度支那法国政权联手，东北部越南难民发现他们的行动和人权越来越受到限制，因为他们被指控为北越“共产主义入侵”的先锋队。^②这一指控也适用于东北部战时游击队领导人（和披汶政府的政治反对派），并由越来越多的美国狂热反共分子培养和推动，这些人在1949—1950年后作为反叛乱顾问、技术人员和“利他主义”学者来到泰国。^③

比里政府下台后，越南难民不得不搬迁到东北部12个干旱省府。未经曼谷警察总署署长的特别许可，他们被禁止离开这个区域。^④1951年，在炮·希亚依（Phao Siyanon）将军接任警察总署署长后，越南难民再次被迫搬迁到更小的区域，即东北8个边境省府。未经曼谷政府许可，他们再次被禁止走出指定区域，而地方官员则随时可以全权决定随时监禁他们，无需指控或审判。^⑤1953年，炮领导下的警察总署将这些地区大约1千名越南男性送到泰国西南部偏远的博他仑府（Phatthalung）和素叻他尼府（Surat Thani）监禁，镇压进一步加剧。^⑥

五、美国侵略印度支那战争时期（1954—1975年）

1954年，越盟抗法斗争取得奠边府（Dien Bien Phu）战役大捷，日内瓦会议结束了法

^① Boonsanong, “Minority Groups and Minority Class,” 21. 关于1950年后美国对泰国统治阶级的拉拢，见 Thomas Lobe 的先锋著作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Aid to the Thailand Police* (Denver: University of Denver Press, 1977) 中有很好的概述。

^② Boonsanong, “Minority Groups...,” 21; Suwansit Naphakhom, 13. 早在1948年，复辟的军国主义者披汶总理就明确表示，他的政权视邻国革命民族主义运动为敌，并希望与“邻国”（即法国殖民政权）合作，镇压扰乱国家正常秩序并逃往泰国的团体。正如他在国民议会第一次施政方略讲话中所提到那样。参见 T. Prathipasen, *Jomphon plak: khunsuk phurai phaendin* (Marshal Plak: The Warlord Who Despoiled the Kingdom) (Bangkok, 1964), 282.

^③ Thomas Lobe, *passim*; Allen Myers, “Counterinsurgency Research on Campus Exposed,” *The Student Mobilizer*, 3:4 (2 April 1970); Eric Wolf and Joseph Jorgensen, “Anthropology on the Warpath in Thailan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pecial Supplement, 19 November 1970, 26-35.

^④ Rit Itthipracha, 63. 1947年至1951年，警察总署署长 Luang Chattrakan Koson 由1947年政变集团任命，不仅主持镇压东北部越南社区，而且他的警察也对东北部泰国人采取类似行动，包括暗杀。十分凑巧的是，Luang Chattrakan 是二战前第一位在美国接受训练的泰国警察。他后来成为越南难民遣返中央委员会主席。传记参见 Kao Nung Sam (pseud.), *Sip et khon samkhan khong muang thai* (泰国十一位重要人物) (Bangkok, 1965), 21-48. 同时参见 Police Major Anan Senakhan, et al., *A. T. R. Antarai* (Police Director-general: Danger) (Bangkok, 1974), 31-33.

^⑤ Suwansit Naphakhom, 13; Rit Itthipracha, 63. 战时披汶政府也曾对在泰国的华人实施过类似的强迫迁移。G. W.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26 ff.

^⑥ Boonsanong, “Minority Groups...,” 21; Rit Itthipracha, 64. 美国亚洲反叛乱政策的总设计师 Edward Lansdale 于1961年的一份报告中的一段话：炮的边境巡逻警察部队最初是由美国在1951年至1952年组建起来的，目的是“应对外国游击队利用泰国做避难所而导致的问题：泰国东部的越盟”。*New York Times*, ed., *Pentagon Papers*, 134. 同时参见 Thomas Lobe, 19 ff. 边境巡逻警察部队至今仍是越南侨民和泰国村民的可怕敌人。

国长达 9 年试图重新殖民印度支那的努力。美国如今支持西贡政权加剧。^①美国驻曼谷大使、中情局要员多诺万将军（Gen. W. Donovan）坚持要求泰国政府把东北部越侨遣返到美国控制下的西贡傀儡政权辖区内。尽管西贡政权起源于法国的殖民政策，但将越侨遣返至南方将是西贡政权宣传其合法性胜利的急需品。这也将有助于美国早期的反共努力，为其傀儡政权作为越南“民族”代表创造合法性。然而，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抗议，声称早些时候被遣返回西贡的 200 个难民家庭最终却死在了集中营。^②

在東越战争最后的痛苦关头，一份匿名的美军研究报告悄然出现在泰国，题为《对泰国叛乱的外部支持：35PL/NVA 联合司令部》，这显然是心理战的产物。这份研究报告在泰国政界和效劳于美国反共利益的曼谷报刊界广为流传，据称这是越南的总体计划，具体指将湄公河西岸（指泰国东北部边境诸府）乃至湄公河下游流域置于河内政权的政治经济控制之中。

越南民主共和国坚持认为，现在难民已达 7 至 8 万人规模，应允许他们自由选择去向。虽然美国和泰国反对这样做（西贡政权也反对），但泰方最终迫于国际舆论压力，同意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泰国红十字会签署所谓的《1959 年仰光协定》（Rangoon Accords）。泰方同意在制定好遣返办法之前收留难民。泰国红十字会委任越南难民遣返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 for the Repatriation of Vietnamese Refugees）来组织这项工作，侨民社区也推选出他们的自己人、广受尊敬的李安（Liem Tran）担任该委员会成员。^③

正如负责遣返工作的泰国官员（1947 年政变后的前警察总署署长）后来被迫承认，在登记遣返的 7 万名难民中，除了大约 80 或 90 人“投反对票”外，其他都表示希望回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管辖范围。即使是最具敌意的目击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越南中部或北部地区，而且因为他们就是喜欢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而不是美国在西贡建立的警察政权。^④从较长一段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完全符合东北部越侨几十年来对解放祖国的承诺。^⑤

尽管南越当局（无疑也包括美国官员）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泰国政府不要执行《1959 年仰光协定》，但由于国际舆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以及难民本身的“非暴力反抗”

^① *Pentagon Papers*, 1-67.

^② Suwansit Naphakhom, 13; Peter A. Poole, *The Vietnamese in Thailan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35-36 (the U.S. counterinsurgency viewpoint-cf. note 67 below); Rit Itthipracha, 63 ff (the Thai counterinsurgency viewpoint-cf. note 69 below). 多诺万将军是美国亚洲反叛乱政策另一位总设计师，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泰国政府在美事务的注册外国代理人。

^③ Poole, 61, 69. 越南难民发言人 Liem Tran (李安) 被 Poole 错称为“Lien Tan”。参见 *Sun* 1: 5 (March 1974), 29-30, 与李安的访谈。该遣返委员会及其后的遣返委员会成员名单参见 *Prachachat*, 3: 148 (16 September 1976), 10-11.

^④ 与遣返委员会主席、警察总署署长 Luang Chattrakon Koson 的访谈 (cf. note 54 above), *ibid.*, 9-10; Suwansit Naphakhom, 13; Boonsanong, 21; Poole, 58 and notes.

^⑤ 1946 年以前，老挝西部的 10 万越侨也普遍存在同样的情绪。Tran Van Dinh, 424. 其中许多人在 1946 年至 1947 年为躲避法国的暴行，逃到泰国。

运动，泰国政府不得不这样做。^①因此，约有 4 万名越法战争早期的越南难民自行选择遣返回越南民主共和国。海路遣返进程持续到 1964 年被美国中断，当时美国开始实施种族灭绝暴行，在老挝和越南领土投放约 600 万吨烈性炸药。^②

早在美国干预印度支那导致遣返进程受阻之前，泰国官方对留在泰国的越南难民的镇压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并引起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多次抗议。1957 年后，沙立（Sarit）将军在美国的支持下从披汶和炮手中夺取了政权，为此泰国警察暴政尤为突出。随着美元的持续注入，更可怕的反共机构和种族主义机构得以建立。^③确切数字可能永远无法得知。但据泰国方面信息估计，1957 年后，每年至少有 200 至 300 名越南难民未经指控或审判而遭到监禁，被关押在呵叻（Korat，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反叛乱行动的关键地点）附近的拉布奥监狱（Latbuakhao）以及曼谷的邦肯（Bangkhen）监狱和塞蒂里（Setsiri）监狱。一些人在这些监狱中被折磨多年，正如其先辈们在 30 年代和 40 年代初曾经遭受的那样。他们中许多人是妇女，根据 1974 年统计，约有 30 名 16 岁以下的儿童。与此同时，东北地区的其他难民成为枪击、抢劫和其他暴行的受害者，而警察几乎没有对袭击者采取任何行动。（事实上，警察有时就是袭击者）。

同时，泰国当局对难民发起一场仇恨运动，将他们描绘成“间谍”“恐怖分子”和危险的“共产主义分子”。^④当然，这场运动并无新意，泰国政府有着多年对付华侨的丰富经验。然而，美国的反叛乱研究加剧反越运动。^⑤正如五角大楼技术专家在一份难民研究长篇报告（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所述：难民社区是泰国的不祥之兆，因为这是其在泰国境内的“越南民族文化的先遣队”。自然地，伴随着这种强加的种族主义解读，有人影射这些社区是共产主义颠覆的温床和东北分裂主义的阴谋，旨在将东北地区从泰国分割

^① Boonsanong, “Minority Groups...,” 22; Poole, chap. V.

^② 80 名越南人签名信，参见 Mukdahan in *Sangkomsat Parithat* 12:5 (May 1974), 7. “……1963 年印度支那战争再次爆发，遣返工作不得不暂停……”；警察总署署长 Luang Chattrakon Koson 接受 *Prachachat* 采访时说“我们曾将他们（难民）成批地送回去，但几年前就停止了，因为那里的局势很混乱。海防遭到轰炸，船只无法进入港口，” cited, 8-10。然而，Peter Poole, 65-66 and note 28 却完全忽视人道问题，将遣返工作的暂停归咎于越南民主共和国，这是反叛分子镇压研究的“最佳”学术水准。

^③ Floo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litary Coup in Thailand* (Berkeley: Indochina Resource Center, 1976), 2-4. Thomas Lobe 的研究报告专注于公共安全办公室的历史和警方对泰国的援助，它并不直接涉及五角大楼的参与，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类似于洛布研究报告的实质性研究。

^④ Inter al.: Suwansit Naphakhom, 13-14; *Prachachat*, issue cited above, 10（引用本期刊收到的“几十封求援信”）；本文引用的其他越南难民给泰国报纸的信。

^⑤ Cf. note 33 above. 1969 年 6 月 6 日，刚从泰国返回的路易斯·洛马克斯（Louis Lomax）在与五角大楼反叛乱项目 JASON 国防咨询小组成员的讨论中透露，泰国当局正在考虑从东北部“运送”（即强制迁移）大约 4 至 5 万名越南人。早在 1967 年 6 月至 7 月期间，JASON 国防咨询小组成员就将这些越南人作为“问题”来讨论，以下这段对话可以证明。（General Maxwell B.）Taylor 说：“你看过湄公河流域的 NVN 殖民地和他们在叛乱中的作用吗？”加州理工学院（C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物理学教授 Murray Gellman 说：“是的，但我们得到的答案是矛盾的。泰国政府认为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The Student Mobilizer*, 3:4 (April 1970), 10, 13。在 60 年代末的 JASON、SEADAG、AACT 等政府机构与美国社会科学家举行的会议上，对东北部越侨社区采取的所有严苛手段都成为讨论的议题：这是马库塞“单向度人”的典型案例（*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1964]）。

出去。^①面对就这一问题的追问，连泰国最高级别的警官们也不得不坦承这一切都是假的，^②但这场运动仍在继续，谬论仍在滋生。如今，这些谬论不仅出现在泰国复辟的种族主义军政府的新闻中，也出现在很多西方国家的新闻中。过去 20 年里，美国在泰国境内外制造大量有关反共文章，并通过美国对泰国社交机构的文化控制和对泰国“社交者”的直接教育，强行灌输给泰国人，这自然导致泰国的文字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受到美国反叛乱综合症的影响。简而言之，东北部的越南难民成为“难题”。泰国文字作品也沉溺于“天然种族反感”“宗族主义”“商业统治阴谋”“政治颠覆”（即“东北分裂主义”）等老生常谈的种族主义议题中。^③自 20 世纪初以来，泰国政府对华人的指控大多也基于此。他们迎合了当地精英的既得利益，而这些精英命运与泰国政府命运同向。因此，这场仇恨运动卓有成效，尤其是在泰国较低级别的文武官员中（鉴于官僚政体性质，这类官员人数众多）。^④

总之，越南难民发现自己越来越束缚于各种限制中。这些限制剥夺了他们的基本人权，而这些基本人权是生活在泰国的其他外侨社群都能享有的，尤其是美国人。未经曼谷警察总署 30 天的事先许可，难民禁止离开其现居住的县郡（*amphoe*）。未经官方许可，他们不得留宿客人，不得与泰人通婚。他们的孩子，尽管许多是出生在泰国，却被拒绝给予泰国公民身份（这违反了 1973 年后的新宪法）。他们的孩子也不能入读泰国学校，尽管这些孩子现在讲泰语比讲越南语还频繁。另一方面，当难民试图自己开办学校时，他们被视为从事“共产主义活动”，并被指责为无视东道国文化。简而言之，他们被迫保持自己得民族身份，并不是像泰国右翼和许多美国研究者所认为是出于某种深刻的“文化反感”，而是出于遭受限制而不得不这样做。^⑤

众多的泰国政府机构在监控和监督“难民问题”方面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其中有些泰国政府机构是在美国反叛乱计划推动下成立的，如国家安全委员会（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剿共行动指挥部（the Communist Suppression Operations Command）、中央情报局（the Central Bureau of Information）、国家安全指挥部（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and）、

^① 美国关于泰国“越侨问题”的反叛乱研究最佳范例当属 Peter A. Poole 的著作。在这部著作的“前言”部分，引用了文本中的这段引文(P. vii)。Poole 曾是五角大楼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的资深官员，他依据美国、泰国和南越官员的证词，以及泰国的越南天主教神父及其教区信徒的证言，撰写了这份广为热议的研究报告。在他 180 页的著作中，他无法提及任何泰语或越南语材料——这一局限性虽然并非至关重要，但却是反叛乱写作的典型特征，反映了其固有的帝国主义傲慢。

^② 文献资料见正文。

^③ 泰语著述中特别恰当的例子是前文提及的 Rit Itthiprachha 著写的 *Yuan ya-le*。这是一篇典型的针对泰国越侨社区的、充满右翼、种族主义和反共言论的长篇斥责，其中夹杂着大量的（译为泰语的）美国反叛乱术语。显然，为了打击社会主义越南对少数民族（包括泰国少数民族）的人道和进步待遇，该书对在旅越泰侨发表了长篇大论。但这是二战前由銮威集（Luang Wichit Wathakan）写的，他是披汶政府种族主义政策臭名昭著的发言人。

^④ Suwansit Naphakhom, 14; *Maharat*, 3:56 (23 March 1973), 16-17.

^⑤ 例如，参见 Charles Keyes, *Isan: Regionalism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23, 70. 其中他正确地断言，“东北部的越侨社区保留了贫民窟或种姓群体的特征……”，但却未能清楚指出导致他们处于这种状态的压迫性制度机制。同样，他重复了民族志传说，即泰国和越南“民族”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族群反感”（我的重点），但没有证明这一广泛的历史假设。然而，根本问题不在于文献资料，而在于理论。美国社会科学以其机械的、静态的（即实证主义）方法来研究人类，永远无法获得马克思主义对国家和人民之间斗争辩证关系的理解。

特警局 (the Special Branch Police)、越南难民局 (the Vietnamese Refugee Bureau), 特别是内政部 (the Interior Ministry)。^①

1973 年 10 月学生起义和他依—巴博 (Thanom-Prapat) 独裁政权的倒台, 导致泰国暂时处于间隔期, 议会此时得以建立, 军队虽然保持不变, 但也暂时退出权力核心 (主要是为了重组其集团的内部权力结构)。^②同一时期, 泰国有了相对的新闻自由, 东北部的越南难民竭尽所能让自己的困境得到泰国民众的关注。数百越南家庭的一家之主和个人给曼谷的进步报刊写信, 详细描述他们所遭受的残酷的人权迫害。^③

1975 年春天, 随着美国在柬埔寨和越南的右翼独裁政权倒台, 以及邻国老挝巴特寮人民革命运动 (popular Pathet Lao movement) 的迅速崛起, 难民地位变得更具不确定性。泰国政府内部的一些派别试图顺应无法治理的现实, 外国观察家经常指出这种策略是泰国对外关系的一个标志。这些举动在泰国外交部表现得尤为明显, 他们试图让泰国与新兴的社会主义邻国以及中国达成和解。其中一个方面是文职政府对学生的默许, 以及民众要求将美国军事基地和军队撤出泰国。自 1973 年 10 月起义以来, 这样的要求就一直存在, 这和一些美国学者的观点截然相反。事实上, 这一要求既是反美的, 也是反巴博—他依政权的。^④

很明显, 无论是泰国右翼军警还是其美国反叛乱支持者, 都不满意这种情况。美国情报界的“黑色宣传”(black propaganda)专家们已在致力于构建“流血事件综合症”(bloodbath syndrome), 以安抚美国良知, 因其在越南和柬埔寨实施种族灭绝政策。他们现在与其泰国门徒们协调, 采取行动阻止泰国与社会主义邻国的任何和解。在柬埔寨战争的最后阶段, 一份匿名的美军研究报告悄然出现在泰国, 题为《对泰国叛乱的外部支持: 35PL/NVA 联合司令部》, 这显然是心理战术的产物。这份研究报告在泰国政界和效劳于美国反共利益的曼谷报刊界广为流传, 据称这是越南的总体计划, 具体指将湄公河西岸 (指泰国东北部边境诸府) 乃至湄公河下游流域置于河内政权的政治经济控制之中。因此, 为美国商业利益服务的曼谷首席新闻发言人于 1975 年 5 月在英文版《泰国商业》(*Business in Thailand*) 上发表文章, 将越南人描述为“一个具有侵略性、获取性和排外性的民族, 被灌输以优越感和救世主式使命感的民族。可以确切断言, 越南人并没有失去征服的意志、欲望和决心……”。类似的文章同时出现在曼谷的主要英文日报《曼谷邮报》(*Bangkok Post*, 被大家熟知的专门服务于美国在泰利益的媒体)上。这两篇文章都是受年初美国陆军心理战研究

^① Suwansit Naphakhom, 14.

^② Flood, “The Thai leftwing ...,” 60-62, and ide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litary Coup in Thailand*, 4-5.

^③ 其中许多发表在泰国反对派期刊报纸的“致编辑的信”栏目中, 详细介绍了其历史问题和特殊问题, 这些期刊报纸包括 *Maharat*, *Sangkomsat Parithat*, *Chaturat*, *Prachchat*, *Athipat* 和 *Prachathippatai*。我在本文中列举了几例。

^④ 例如, 参见 Jeffrey Race, “Thailand 1973: ‘We Certainly Have Been Ravaged by Something...’,” *Asian Survey*, XIV: 2 (February 1974), 199-202. 这是欧洲中心主义分析的一个典例, 包括“旧政权”“1848”等, 把 1973 年 10 月起义描绘成美国式民主的一次尝试。

报告的启发。^①

美国的此类情报战和心理战行动显然是针对 1975 年 4 月柬埔寨和越南革命胜利，在泰国人（和美国人）中制造反共恐慌，最终目的是“搞乱”1973 年 10 月之后的泰国民主实验，并恢复亲美右翼独裁统治。^②随着这一精心策划计划往前推进，泰国右翼集团（与美国建立的反叛乱部队和司令部关系牢固）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在这一点上，最直言不讳的是新法西斯主义的“新力量”（Nawaphon）组织，该组织与美国及其在泰国反叛乱的后代“泰国国内镇压行动指挥部”（kong amnoeikanraksa kbwammankhong pbainai 或 ISOC）都有联系。^③“新力量”的高调发言人、曾留学美国的瓦塔纳·希奥维蒙（Wathana Khieowimon）“博士”在 1975 年 3 月“新力量基金会”成立后首次发表公开声明，断言将民主进程带给泰国的进步学生实际上是共产主义庞大阴谋的一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夺取东北各府并将其并入“大印度支那”（Greater Indochina），甚至并入中国。^④

^① Michael Morrow, “U.S. Policy in the Mekhong,” *The Asian Mail*, January 1977, 21. 这只是精心策划的“黑色宣传”和“虚假信息”计划中的一个表现，旨在用“斯大林主义者”笔触描绘中国和前法属印度支那的社会主义国家。该计划在美国的发展势头正猛，其目的之一无疑是在美国国会通过这些国家散播“大规模处决”“酷刑”等人造的媒体编撰来诋毁人权游说团体。通过这种方式，将人权问题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侵犯人权行为”联系起来，从而削弱人权活动家迄今为止为切断国会对美国撑腰的警察独裁政权的资助而成功开展的竞选活动，从而减少旧的反战联盟在美国国会享有的最后道德影响力，同时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对人类尊严的真正侵犯上转移开来，这种侵犯每时每刻都发生在泰国、韩国、伊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其他“自由世界”国家。

^② 参见 Floo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litary Coup in Thailand,” *passim*. 10 月 6 日政变后，泰国的报纸竞相刊登最耸人听闻的标题，声称老挝和柬埔寨即将入侵泰国。然而，如果仔细阅读报道，就会明显看出，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泰国边境巡逻警察部队指使下的苗人部落成员是这些事件在老挝的始作俑者。在泰柬边境上，得到泰国边境巡逻警察部队支持的原朗诺部队及其散兵游勇是问题所在。例如，参见近几个月来《国家报》（*Ban Muang*）关于这方面的报道。

^③ 作为一种政治观念，“新力量”似乎源于一些军官，例如 Samran Phatayakun 将军、Jannien Wongphaibun 中将、已退役将军 Wanlop Rotjanawisut——他们都与 CSOC 有一定的联系，CSOC 是 ISOC（泰国国内镇压行动指挥部）的反叛乱前身，该组织与下列人物有关联：在梭桃邑（Sathahib）港口的海军军官，还有一些来历不明的准佛教徒，他们活跃在佛教心理健康研究所（Jittaphawan），该所位于曼谷和是拉差（Siracha）之间的素坤逸（Sukhumvit）公路边，或许还和皇宫有关联。除了众所周知的美国创建 CSOC-ISOC 的反叛乱功能外，邦拉蒙（Banglamun）的佛教心理健康研究所建筑群在 7 到 8 年或更长时间里一直是泰国法西斯式崇拜的堡垒，无论是佛教徒还是泰国学生，他们经常使用其图书馆和其他设备，这些设备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军官们。“新力量僧侣”吉迪乌托（Kittiwuttho，参见 Ben Anderson's 在本期《通报》上发表的文章）在这个崭新的学院中首次发表了煽动性言论。作为一个法律实体，新力量基金会（*munnitthi nawapbon*）成立于 1975 年 3 月，最初的目标是教育青年。当时，它的公关人员，曾留学美国的 Wathana Khieowimon，在佛教心理健康研究所开设了培训课程，吉迪乌托强迫周边省府的僧侣报名并接受新力量文学。然而，大多数人认为它是 CSOC 的延伸，并拒绝了它。在一场典型的中情局策略中，一封伪造的信件声称新力量于 1975 年 8 月中情局收到 2.5 亿美元，这封信件来自一份不存在的美国报纸，其明显目的是破坏这两个组织之间广为人知的联系。然而，泰国批评家立即指出，实际上它并不需要这样的资金，因为它的支持者包括老派保皇党、贵族、酒店业主、金融家、银行家等，此外还有罪犯、匪徒、杀手、鸦片贩子、警察军人和僧侣等。该组织成立秘书处，由瓦塔纳（Wathana）担任负责人，并于 1975 年 8 月底出版了第一份报纸。*Maharat*, 29 March 1975, 4-6; *id.*, 30 August 1975, 3; *idem*, 6 September 1975, 12; *idem*, 13 September 1975, 5; *Athipat*, 18 April 1975, 5; *id.*, 22 April 1975, 5; *id.*, 8 July 1975, 1; *id.*, 5 August 1975, 4. 关于官方对“新力量（Nawaphon）”这个名称的解释，见其报纸 *Kaen Prachachon*, 28 August 1975, 2.

^④ *Maharat*, 29 March 1975, 6.

1973年10月后，格利·西瓦拉（Krit Siwara）将军领导相对温和的军事集团掌控议会幕后实权，深感来自“新力量”极右翼诉求的威胁，公开谴责其蛊惑人心的行为。格利驳斥瓦塔纳的反共产主义恐惧论，并对共产党军队计划夺取东北各府的说法嗤之以鼻。^①然而，这种蛊惑人心的做法仍在继续，并且对越南难民造成了不可避免的伤害，涉及人数随着逃离越南最终战争的新增难民的抵达而激增。1975年5月，泰国东北部的侨民社区成为大规模屠杀和暴动的目标，时任内政部副部长断然宣称，这些屠杀和暴动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煽动的，目的是让泰国政府在与新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关系尴尬。^②国防部长普拉曼·阿迪雷斯坎（Praman Adireskan）曾发表一系列反越南难民申明。尽管如此，他还是坚信东北部暴动看似“新力量”干的。^③

与这类仇恨计划同出一辙，一些（虽然不是全部）军警官员、文职官员和政客们把难民社区视为阻止与印度支那社会主义国家和解的现成手段，政客的典型代表是公开自称为“右翼精神”的沙马·顺达卫（Samak Sunthonwet）。这些国家现在所走的革命和平等道路显然让曼谷的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精英和及其美国支持者们感到不适，因此有必要在泰国公众眼中歪曲这些革命的性质。为了符合上述美国心理战主题，一场大规模运动将边境地带上越南难民的存在与所谓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武力掠夺泰国东北部的“入侵计划”联系起来。东北越南难民又一次扮演了“先锋队”的角色。^④

1975年12月，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撤离的美国雇佣军留下的“80万支美式步枪”对泰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并且还尤其强调泰国境内约有7万名越南难民，其中有可能出现执行“北越”行动的“第五纵队”。

同月，即1975年12月，泰国国王普密蓬（Phumiphon）呼吁全国人民积极准备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他的统治时期正好跨越美国对泰国的新殖民化，而且众所周知的是，他对美国物质文化非常着迷，从爵士乐到绿色贝雷帽和M-16步枪带来的职业神秘感。“敌人想要控制我们国家，泰国当前正是他们的直接目标，”他宣布。“敌人正在发动力量来对付我们，并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阶段，这是对我国的直接侵略。”这些声明，加上对“蓄意破坏”等词语的含糊运用，使国王完全站在了国内反越运动的一边。^⑤

与这场运动相反，泰国外交部提出与现已独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1975年春，泰国外交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会谈提出首要议题，即根据《1959年仰光协定》遣返家属印度支那战争中遗留的难民。1976年7月20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副外长访问曼谷，会谈达到高潮。为此，泰国政府内外右翼势力采取激烈行动。就在这次访问刚刚结束后，由泰国军方和右翼控制的报纸和电台发起了大规模谣言行动，暗示难民社区到处藏匿着武器，并扬言难民曾深度参与全国各地的破坏和“渗透”阴谋。具体地说，针对难民的集会和民众暴动的反越南仇恨团体出现得如此突然，为此可以断定这并非自发组织的。这些团体包括在那空拍依府的“爱国者团体”（Patriots' Group），以及在沙功那空府和

^① 详见 Nawon Bangpakong 的社论，同上，4。

^② B.R.O'G. Anderson, et al., "Thailand Fact Sheet (1932-1976)," unpubl. ms. (Cornell University), 8. 笔者不知道其原始来源。

^③ *Athipat*, 9 May 1975, 11; *Maharat*, 6 September 1975, 12.

^④ *Chaturat*, 17 August 1976, 对这场运动做了很好的综述。

^⑤ 引自 *The Asian Student*, 20 December 1975 and 5 January 1976.

乌隆府等地组织严密的“泰国反越南难民团体”（Anti-Vietnamese Refugee Group of Thailand）。接下来的日子如噩梦般，泰国警察在东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未经指控逮捕大约 1.6 万名难民，后两个地区的围捕行动对象主要是逃离西贡政权末期的难民。警方在曼谷市内对越南人进行了大搜捕。8 月和 9 月，在东北部的沙功那空府和那空拍依府，由技校学生和失业的乡村流氓组成的暴徒无情地洗劫了那里的难民定居点。这些暴民甚至袭击了试图保护难民的当地政府和警察官员。^①

1976 年夏末的煽动和暴徒事件的直接起因似乎是内政副部长沙马·顺达卫，间接起因是国内镇压行动指挥部。沙马·顺达卫对越南难民提出公开煽动性指控，毫不掩饰他表达对外交部及印度支那新独立社会主义国家和解政策的厌恶。他攻击外交部和当时掌权的社尼·莫（Seni Pramot）政府，认为虽然右翼将其推上了台，但其表现却与右翼理念背道而驰。事实上，他指责外交部长，说外交部长宁愿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老挝建立友谊，也不愿与泰国老朋友美国交往。^②沙马还对自己部门管辖的警察部队表示不满，因为其高级官员公开否认沙马副部长 8 月对越南人的指控。特警局局长桑塔·塔纳普米（Santhat Thanaphumi）将军否认他曾向总理提交过有关越南阴谋和破坏分子的报告。特警局副局长卡森·绅密（Kasem Saengmit）上校更是明确表示：“我们一直在关注每一个可能想破坏国家安全的国民动向。”他公开表示：“但我们现在不能说越南难民是否会进行破坏行动……”其他高级警察官员在接受泰国媒体询问时，对越南人威胁国家安全的整个事件也是嗤之以鼻。沙马向媒体表示，他将很快介入并会更严格控制警方。^③他的确这样做了，既给越南人带来不幸，也给泰国的民主带来灾难。

很明显，国内镇压行动指挥部也参与了夏末秋初针对越南人的右翼煽动行动。1976 年 9 月初，沙功那空府尹、副府尹和乌隆府副府尹（这两府都长期有越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指责曼谷的某些政党派别，包括某些国会议员，煽动农村暴徒对越南人施暴。他们明确表示，这背后的政治动机是计划利用越南难民问题来“搞乱”政府，从而阻止泰越外交和解。尽管沙功那空的副府尹本人长期担任反叛乱专家，他对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否直接参与这场不断升级的妄论表示怀疑，他毫不犹豫地告诉媒体，国内镇压行动指挥部总部刚刚向他转交了一些文件，文件声称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计划占领泰国东北部的几个省府，包括他管辖的省府。他对此表示极大的怀疑，并与刚才提到的其他官员一起明确表示，风波是人为制造的。“我确定，”他说，“在这件事上，国内外都各有政治动机……”^④这句话的意思似乎很清楚，泰国人和美国人都参与了此事。

9 月中旬，国内镇压行动指挥部和美国进一步卷入越南难民骚乱。当时至少有两家独

^① 继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访问后，这些事件的简要年表摘自 *Chaturat*, 15 September 1976, 20-21。在本期杂志的第 22 页上，登载一份冗长的政策宣言和针对难民的详细投诉清单，这些内容由“泰国反越南难民团体”作为传单进行分发。那空拍依府那帕依区（Phanom）26 名越南难民记录了这几周内其他针对难民的暴力事件，这些记录在 *Chaturat*, 7 September 1976, 2-3, and id., 28 September 1976, 3-4。来自那空拍依府 Muang 区十名难民的信。

^② 参见 *Chaturat*, 7 September 1976, 31-35。与内政部长沙马的访谈。关于内政部的其他煽动性言论，参见 *Chaturat*, 17 August 1976, 16-18。

^③ 以上的信息都是基于 *Chaturat* 所提到的人物采访，具体的引用请参考原始文献。

^④ 提及的人员访谈引自 *Chaturat*, 14 September 1976, 19-24。

立的泰国杂志报道说，泰国红十字会单方面重组了越南难民遣返中央委员会，并将越南人李安赶出了该委员会。李安在东北移民中享有正直声誉，他自 1959 年以来连续被泰国任命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就像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东北地区的其他难民一样，他的忠诚度毋庸置疑：忠诚于胡志明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将李安从中央委员会除名后，泰国当局在没有与难民社区协商的情况下，任命邓文光（Tuong Dang Van）代替他。上述两份期刊都报道说，此人是国内镇压行动指挥部组织的代理人，而且与最近在西贡倒台的阮文绍政权关系非常密切。这两份期刊还暗示美国大使馆参与该事件，但缺乏直接证据。^①

尽管内务部持反动立场，尽管国内镇压行动指挥部相关右翼团体散布有关越南难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侵略意图”的煽动性谣言，泰国外交部仍然继续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就外交关系和 40 年代末法属印度支那战争中留存的约 6 万名难民遣返问题进行谈判。9 月下旬，外交部公开向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保证，对难民的袭击是流氓行为，并不代表泰国官方想法。与此同时，外交部还特别提醒国内和解政策反对者，这些事件决不会破坏泰国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邦交正常化所做出的努力，并暗示也不会破坏与社会主义国家老挝的邦交正常化。^②

六、保守的泰国（“10 月 6 日”起义及之后）

1976 年 10 月 6 日，由美国训练和武装的右翼军队和准军事部队在位于曼谷的法政大学（Thammasat University）及其周边地区屠杀手无寸铁的无辜泰国学生，泰国短暂的准议会政府以暴力行动而告终。不足为奇的是，大屠杀当天，右翼军队和民间消息人士都在传言“越南破坏分子”出现在法政大学校园内。然而没有丝毫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③

3 年来，一直试图报道他们困境的泰国独立媒体被禁言，剩下的那些卑躬屈膝的杂志也无法提供任何帮助，因为它们当时只报道皇室活动、体育赛事、选美比赛等，基本上就像 1973 年以前的情形。鉴于这种社会和政治上的空洞报道，关于越南难民情况的报道更具紧迫感。但是这种报道如今被掌控在西方主要新闻机构的记者手中，而这些新闻机构本身接纳新政权。不幸的是，对越南人来说，在接受关于越南少数民族的旧反共路线方面，西方媒体建制派表现出了一种并非没有过的天真。1976 年深秋，《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世界报》（*Le Monde*）对 10 月 6 日后的每日逮捕和针对难民的

^① *Chaturat*, 21 September 1976, 1; *Prachachat*, 16 September 1976, 11-12. 关于李安，见前文论述。

^② *Chaturat*, 28 September 1976, 6-7. 1976 年 9 月 18 日，总理社尼·巴莫对美联社分社的新闻报道几乎不屑一顾，该报道称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将扩大其在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的影响力。笔者我所知，在当时的背景下，实际上并没有做出这样的宣布。相关资料参见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Thailand, 21 September 1976。

^③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976 (Simons, Bangkok); *Manichi*, 8 October 1976 (Shibata and Ito, Bangkok); *Le Monde*, 9 October 1976 (de Beer, Bangkok). 该起政变最合理的报道出自 Martin Woolcott, *The Guardian*, 17 October 1976. 在政变后的 8 天，泰国高级官员通过曼谷的美国大使馆向美国提出请求，要求提供核武器以阻止据称来自越南的攻击。这象征性地是对美国技术的赤裸请求，以阻止席卷曼谷精英阶层的社会革命潮流。参见 Jeffrey Stein, “Thais Sought Nukes from the U.S.,” PNS, Washington.

暴力事件进行了适时报道，记者们既没有认真质疑难民是安全威胁的基本前提，也没有质疑美泰反叛乱专家多年来提出的“先锋队”理论。^①没有人报道这样一个明显事实，即即使是泰国警察和省府高官，在短短几个月前也完全不认可这一想法。更严重的是，“自由世界”的伟大媒体代表似乎并没有质疑下述情况的潜在深层原因，即泰国政府声称越南马上要跳起来猛攻其邻国，甚至连喘气的时间都不必。^②尽管越南事实上是这样一个国家：美国刚刚投下 400 万吨炸弹，造成 170 万人死亡，320 万人受伤，1200 万人无家可归，喷洒 1800 万加仑有毒化学脱叶剂，剥蚀越南 600 万英亩的农田，地里埋下数百吨未爆炸的炸弹。所有这些都给越南人民的社会结构带来了严重的创伤。

西方主要报纸所能做的就是重复那些老掉牙的反叛乱陈词滥调：“……泰人长期以来一直害怕和不喜欢混迹其中的越侨。”越南人一直“保持宗族主义，而且……很少有人与泰人结婚或努力融入泰国……”许多人认为具有经济影响力的越侨社区是游击队的温床，是河内支持[泰国国内]叛乱的通道……”^③有了这种“敏锐”的报道，人们自然认为越南人活该遭受东北地区的暴力。

显然，泰国东北部越侨社区的长期斗争正进入一个充满悲剧和痛苦的新阶段，因为他们继续成为美泰操纵反叛乱计划的受害者，从更广义上说，他们是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直美国将泰国操控于股掌之中的“反对共产主义扩张计划”的受害者。

10 月 6 日军事政变之前，越南人返回祖国看似前景光明，但尽管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试图让泰国新政府遵守 10 月 6 日前民选政府达成的协议，泰国官方的反共和沙文主义的新政策还是扼杀了遣返进程的可能性。越侨社区遭受的暴行促使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红十字会向泰国红十字会的女赞助人诗丽吉（Sirikhit）王后发出电报，抗议对人权的侵犯行为。^④随着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抗议活动愈演愈烈，新政府于 1976 年 11 月 18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总理他宁（Thanin）和外交部长向外国记者保证，泰国不仅原则上支持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而且还认为应该继续执行前政府和河内于 1976 年 8 月 6 日签署的关于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协议。然而，总理在国内强调狂热的反共政策，再加上持续的反越仇恨运动，掩盖了这些话的诚意。^⑤

几乎与这次新闻发布会同时，唯唯诺诺哗众取宠的泰国媒体散布谣言，说越南餐馆在面条中注入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会使男性性器官萎缩。据报道，数千名泰国男子因此被送往医院。^⑥

^① 这类报道的例子见于 *Le Monde*, 17 October 1976 (de Beer, Bangkok); *San Jose Mercury*, 19 October 1976 (UPI, Bangkok); *New York Times*, 3 November 1976 (AP, Bangkok); *Washington Post*, 27 October 1976 (L. Simons, Bangkok).

^② Indochina Resource Center, *A Time to Heal: The Effects of War on Vietnam, Laos, Cambodia and America*, Washington, 1976, 4 ff.

^③ 这些引用来自 *New York Times*, 3 November 1976 (AP, Nongkhai), 以及 *Washington Post*, 27 October 1976 (L. Simons, Nakhon Phanom)。特别是后者 Simon 的措辞表明他刚刚阅读了此研究中其他地方引用的 Poole 和 Keyes 的著作。来自其他知名新闻记者，如 Patrice de Beer、George Macarthur 和 David Andleman 的报道也夹杂着类似的陈词滥调和无批判应用的刻板印象。

^④ *New Asia News*, 26 November 1976.

^⑤ *Mainichi*, 19 November 1976 (Shibata, Bangkok).

^⑥ *New Asia News*, 26 November 1976.

在新政府的反越运动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前社尼·巴莫政府的原内政部副部长沙马·顺达卫崭露头角，飞黄腾达。沙马事实上就是“右翼精神”的代表，正如他在 1976 年夏天对新闻记者所自称的那样。他与 10 月 6 日前的新法西斯运动(neo-fascist movements)有密切联系，是右翼流氓团伙“红牛”(Krathing Daeng)公开宣扬的英雄，并与国内安全行动指挥部联系密切，该司令军在 10 月 6 日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如何，他从政变中崛起，成为新军政府的首席发言人，成为民族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反共偏执狂的意识形态倡导者，坚定不移地忠诚于军国主义国家的“民族—宗教—国王”立国三原则。他也是反越南仇恨运动最一贯的倡导者。^①

正如他在 1976 年夏天（政变前几个月）所预测的那样，沙马在 10 月 6 日宣布新政府阵容时出任内政部长。这使他有时间清洗内政部和警察部门中那些在反共、反越运动中表现得不如他狂热的人。他清除了警察机构内部的政敌后，就可以随心所欲了。^②1976 年 12 月 9 日，他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越南的一项秘密计划。根据该项计划，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将于 1977 年 2 月入侵泰国。

这次会议和“计划”的诸多细节暴露出，目前泰国社会结构中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与国家为其特殊利益而管控少数民族的政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根据沙马的说法，1977 年 2 月 15 日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秘密入侵计划的行动日。然而在此之前，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打算从 12 月 15 日左右开始煽动劳工纠纷，这将会导致商业公司、工厂和车间的工人大罢工。随之而来的是东北部越南难民的内乱，难民们显然会假装陷入内部战斗。这些又会导致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外交“误解”，并成为后者军队入侵泰国的借口。沙马甚至列出了入侵的路线：（1）穿越泰国、老挝和缅甸边境交汇处的北部山区；（2）从老挝南部跨过湄公河，向乌汶府(Ubon Ratchathani)进发；（3）从柬埔寨西部穿过亚兰(Aranya Prathet)。内政部长特别指出，这 3 条路线都经过勘察，并且路面干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坦克完全可以通行。最后，他宣布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不真正希望遣返东北地区的难民，而是恰恰相反，真正计划利用他们作为入侵泰国的先锋部队。^③

越侨社区在当今泰国政府的官方管控政策中所起的确切作用在沙马讲话中显而易见。首先，正如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向 10 月 6 日后新政府提出的抗议中所认识到的，反共产主义，此种情况下即恶毒的反河内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手段，旨在让泰国人民的注意力发生转移，让他们不去关注自身社会的严重不公、不人道和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异。^④因此，内政部长沙马等领导人进行疯狂的宣传。其次，对于那些众多的泰国人民、农民、工人、低薪和受压迫的官僚和军警官员以及其他已经意识到其社会压迫危险状况的人来说，“骚乱”和停工等类似事件很容易与来自河内和越南难民的巨大“威胁”联系起来（沙马

^① 与沙马的访谈引自 *Chaturat*, 7 September 1976, 31-35。

^② 在担任内政部高级职位后，沙马立即进行人事调整，其中包括将警察将军 Sirisuk 调任为副部长，并提拔警察中将 Monchai Phankhonchoen 担任代理警察总署署长。这些信息来自匿名者#1。

^③ 12 月 9 日在西半球的时间上对应的是 12 月 8 日。沙马的新闻发布会报道出自 *Bangkok Deli Thaim*, 9 December 1976, 1, 3, 16。一天之前，伯克利的 *Pacifica* 新闻广播引用路透社的一份电报，援引泰国国防部官员声称他们拥有秘密文件，证明越南民主共和国将在两个月内入侵泰国。

^④ *Thai Samakkhi*（在美国发行的泰文反对派报纸），1 January 1977, 4，引用 *Nan Dhan* 和其他越南报纸，他们对内政部长的荒谬指控做出了反应。

显然就是这样做的), 因此他们被官方宣布为颠覆分子。那么在某种意义上, 这些难民为当今泰国的军国主义统治者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功能”: 就像之前的华人一样, 他们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纵的工具。在泰国官方对待华侨和越侨少数民族的问题上, 看得最清楚的人是已故的布萨隆·卜育亚那(Boonsanong Punyodyana)博士。他是著名的泰国社会学家, 公认的泰国少数民族问题专家, 1973年推翻他依一巴博独裁者的宪法运动领导人, 1974年泰国社会党(Thai Socialist Party)创始人, 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 他直言不讳地反对泰国专制的官僚体制。1976年初, 他在自己家门前被右翼刺客枪杀。在此前不久, 他还在代表泰国少数民族著述和演讲。他识破了针对泰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反叛乱途径的自私自利本质, 包括越侨问题。他也认清了英国、荷兰、法国、日本以及最近的美国的老套分裂策略: 通过让被征服者自相残杀来维持对其的征服。与反叛乱的观点相反, 他认识到越南人、泰人、华人或其他族群之间并无天然的或先天的敌意。相反, 他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只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问题:

……泰国社会中少数族群的困境不是来自于多数人的偏见和歧视……问题的根源在于特权统治阶级及其渗透和颠覆机制。^①

正如这篇简短评述所说的那样, 越侨在东北地区的困境确实不是由于泰国人民的偏见造成的, 它是泰国政府的阴谋。印度支那的巨大社会动荡真正开始于200多年前的西山起义, 并在18世纪送来了一批保皇派难民, 而如今又送来了另一类具有鲜明革命意识的难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越南难民从未沉迷于针对泰国的革命活动。在这个意义上, 反叛乱技术官僚的“先锋队理论”是对事实的嘲弄。然而从另一种迥然异义来说, 他们确实是“先锋队”, 但并非为了越南对泰国的民族征服, 因为这种行为在1975年4月西贡解放后, 随着越南傀儡政权的消失而消失了。

相反, 他们只是成功推翻国内政府精英压迫的典范, 以及成功赶走外国帝国主义腐朽存在的典范。在这个历史意义上, 他们是旧西山叛军“咆哮之军”的久远回声, 带着社会革命的幽灵, 回来困扰泰国目前享有特权的统治者及其帝国主义支持者。

(原载美国《亚洲问题学者通报》(*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9, No. 3, July-September, 1977)

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陈欣
成都大学泰国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杜洁
成都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 王利华
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林艺佳 译

^① Boonsanong, “Minority Groups...,” 24.